

XISHUO
ZERENTIAN

细说责任田

——1961年安徽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陆德生 ·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XISHUO
ZERENTIAN

细说责任田

——1961年安徽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陆德生 ·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说“责任田”:1961年安徽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陆德生
编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664-1034-4

I. ①细… II. ①陆… III. ①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安徽省—1961 IV. ①F32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4263 号

细说“责任田”

——1961年安徽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陆德生 编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8.5
字 数: 96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00元

ISBN 978-7-5664-1034-4

策划编辑: 马晓波
责任编辑: 马晓波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目 录

一 开场白	〔001〕
二 缘起——动因	〔006〕
三 来自各方面的推动力量	〔009〕
四 酝酿与提出的过程	〔013〕
五 南新庄试点	〔019〕
六 广州会议期间	〔023〕
七 精心指导 稳步推行	〔029〕
八 石关会议和毛泽东蚌埠谈话	〔037〕
九 春华秋实	〔041〕
十 毛泽东无锡谈话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049〕
十一 改变“责任田”过程中引发的一场大争论	〔056〕
十二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狠批 “三股风”与“责任田”的夭折	〔062〕
十三 对“责任田”的理论分析与理论概括	〔065〕
十四 结束语	〔070〕

附 录	〔077〕
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	〔079〕
关于“责任田”问题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085〕
关于宿县褚兰公社老农刘庆兰思想情况的了解 材料	〔089〕
关于肥东等六县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 的情况	〔094〕
中共宿县符离区委会全体同志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	〔104〕
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	〔114〕
蚌埠铁路局公布蚌埠郑州间临时客车时刻的命令 ...	〔126〕

一 开场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 年 10 月—2009 年 9 月）》，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来的发展历程和重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的 1961 年部分共有四条重要内容，其中之一就是：“3 月 6 日，安徽省委依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其他部分省区也实行了类似办法。”这段记述中所说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简称为“责任田”。群众从实践中尝到了甜头，称它为“救命田”；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则称它是我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它的明效大验，早已为人所熟知、所首肯，它在探索和推进我国农村改革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已成为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把它作为一条重要内容记录在册，也说明了“责任田”在共和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50 多年前的 1961 年初春，在安徽大地上，有一颗耀眼的明星，冲破层层乌云，腾空升起，震惊寰宇，为广大农民带来了福音和希望。这就是由当时安徽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倡导、组织推行的“责任田”。它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960年前后，安徽广大农村乃至全国农村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现在的老年人都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而年青一代则不甚了解。当时，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日益严重，大刮共产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天灾人祸不断，农业连年减产，农村经济一蹶不振，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安徽农村的问题非常突出，中共安徽省委顾问委员会原副主任侯永主编的《当代安徽简史》对此作了概要叙述。书中指出：由于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供应不足，1958年底至1959年初，伴随严冬的降临，首先是农村人口吃饭出现困难，农村劳力开始外流，个别地方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粮荒蔓延，农村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不足200斤，全省城乡有2900万人口处于饥饿线上，“饿、病、逃、荒、死”现象十分严重。1959年，全省人口出现低出生率、高死亡率的情况。当年，全省总人口为3426万人，出生率为19.8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17‰，自然增长人口仅108158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1960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11.35‰，死亡率上升，达到68.58‰，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负增长，为-57.23‰，全省总人口呈负增长态势。净减少的人口，包括当年正常死亡人口，一部分迁移外省人口，少数漏报人口，由于饥病而死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最多的年份。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9月又发出了关于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和降低城乡口粮标准的两个指示，特别是在11月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以及《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以“共产风”为重点的，包括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五股歪

风。当时，全国各地包括安徽在内，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都是比较认真的，下了很大气力。但是，由于积重难返，加上元气大伤，成效并不很明显，农村的荒凉情况依然很严重。

从各省来说，鉴于形势紧迫，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渡过难关，战胜灾荒，探索怎样走出困境，打开新的局面。有的在缩减城市劳动力上下功夫，有的大规模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有的提出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轻负担。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都不是很大。也有少数人形成了另一种思维定式，遇到问题就在阶级斗争上找原因，主张狠抓阶级斗争，扫除障碍。当时河南就总结了信阳地区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并将之传遍全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曾希圣作为主政一个大省的主要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他既为工作上的失误而痛责自己，一再检讨，又为如何突破框框，另辟蹊径而忧思不已，上下求索。曾希圣不管是革命时期从事密码破译工作，还是开创皖江抗日根据地；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后搞农业“三改”（解决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是推行“责任田”（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都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在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和特点上下功夫，从而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制定相应的对策，达到开拓创新的目的。

曾希圣和他身边的工作班子，精心研究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生产管理体制及不同做法，查阅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农庄的生产管理办法，在深入剖析我国人民公社生产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广泛听取群众呼声的基础上，经过试点，逐步找到了广受好评、深受欢迎的“责任田”办法。

“责任田”是群众性的概括，全称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又改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实际上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于安徽兴起，虽然很快夭折，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安徽当代史上

的一件大事。当时，它冲破了“左”的重重阻力，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向“左”的方向扩展，最终被“左”的思想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如此，它对安徽经济发展、对探索农村改革、对改善农民生活，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赞赏、所肯定。

安徽“责任田”是历史的产物，是群众智慧与实践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发起者、倡导者、大力推行者曾希圣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作出的巨大贡献。曾希圣光辉的革命一生中，有三大贡献：一是在军事技侦中，特别是在长征中，破获了敌人的大量密码，作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曾希圣是二局局长），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二是在抗战期间，负责组建七师、开创皖江根据地。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安徽大抓农业、治淮，倡导“三改”，特别是推行“责任田”制度，更是开拓创新的举措，一举扭转了安徽农村的严重困难状况。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的创举，受到了人民的赞赏，得到了党内很多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1982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安徽视察指导工作，在谈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时指出：“从历史情况来说，在1960年以后，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先知先觉者，当时主张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李先念在为《曾希圣传》写的序中说：“他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在当时‘左’倾思想大肆泛滥的情况下，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通，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弊端，并且经过亲自调查研究，亲自试点，率先提出了责任田办法，很快推广到全省，并波及邻省乃至全国。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急、

开创新局面的作用。曾希圣同志提出和倡导的责任田办法,对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引路的作用。今日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曾希圣同志可以含笑九泉了。”

1988年7月,宋任穷、陈丕显、叶飞在为纪念曾希圣逝世20周年而写的《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一文中指出:“在当前加快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形势下,更加使人自然地回想起他于六十年代初期,在安徽农村倡导实行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责任田’事迹。”“希圣同志能在当时研究提出和率先倡导‘责任田’,表现了他具有一个改革先行者的胆识。”“当年安徽全面推行‘责任田’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实验,但为时不久,这一刚刚兴起的新事物就受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央和地方不少老同志为‘责任田’说公道话,仗义执言。”“‘责任田’虽然受到夭折,但它已深深扎根于江淮大地,扎根于广大农民心坎深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与希圣同志当年所倡导推行‘责任田’的实践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农村改革的深化发展,已经为‘责任田’的是非曲直作了公正的评价,证明它在当时和今天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 缘起——动因

安徽省委和曾希圣下定决心推行“责任田”办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面对人民的苦难和深重的农业危机，实事求是，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勇于逆着风浪闯出一条新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安徽历来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多灾低产的地方，一遇灾荒，饥民遍地，农村凋零，惨不忍睹。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十分重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他用很大精力抓“土改”，抓救灾和治水。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安徽的气象特点、地域环境与农业现状，经过试点提出了农业三项改革办法，即改革季节的收成比重，提高夏收比重（因为夏季收获的作物能够避灾）；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农业三项改革办法从1954年在全省大力推广实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正常年景粮食明显增产，大灾年景粮食损失降低。所以说，当时安徽农业发展是比较好、比较快的。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连续增长，1953年全省粮食产量181亿斤，1954年遭受大灾，因推行“三改”受灾损失减轻，产量仍有162亿斤，1955年达到创纪录的236亿斤。在大搞“大跃进”的

1958年,秋季粮食生产情况还算可以,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大批劳动力被外调,加上急急匆匆大办人民公社,生产管理混乱,粮食没有丰收,浪费损失很大,实际产量只有176.9亿斤。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紧张和严重缺粮的情况,1959年全省粮食产量只有140.2亿斤,国家征购高达70亿斤,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1960年全省粮食继续减产,总产只有135亿斤,国家征购近50亿斤。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农村盛行大兵团作战,水利工地用工过多,又不准搞副业生产,集市贸易也日益衰微,农民除一点口粮维持生计外,别无其他谋生途径。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农村的严重问题是逐步暴露出来的,它的严重性也是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的。从1959年郑州会议开始局部纠“左”以后,安徽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体制上虽然作了一些改进,但都是在原有框架下的小修小补,不能解决问题。省内一些地方出现过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形式,省委也曾给予肯定和支持。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狠批右倾思潮的冲击下,“左”的思想更加泛滥。从1960年夏季开始,曾希圣越来越感到农村形势严峻,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他以一种深沉的负罪感和高度的责任心,聚精会神思考怎样改变现状,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他先是考虑实行“双包制”,由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实际上就是搞包产到组,减少和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增强小组成员的责任心。后来又进一步研究怎样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并联系工业等方面的责任制,探索“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责任田”办法。有人说:曾希圣是“左”后纠“左”;有人说:曾希圣独排众议,力挽狂澜。毋庸讳言,曾希圣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确实一度头脑发热,积极推行“左”的一套,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搞了“左”,犯了错,遭了殃,从中取得了教训,清醒了头脑,敢于正视现实,而不讳疾忌医,回过头

来坚决纠“左”，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下定决心动大手术。这就会有很大的风险，遇到很多的阻力。他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突破旧体制，以少有的魄力倡导推行“责任田”办法，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农业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曾希圣经常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对人民负责。不能明明看到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敢抛弃它。”他还说：“农村经济衰退，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说明我们过去的工作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对人民犯了罪。现在，任何的私心杂念，都是我们对人民犯下的新罪。”“安徽的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我下决心要把安徽的问题解决好，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戴罪立功。”可以说，严重的农业危机引起了曾希圣的反思，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曾希圣殚精竭虑、百折不挠地提出和推行“责任田”，为农村改革立了大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来自各方面的推动力量

实行“责任田”，是一项突破性的创举，曾希圣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胆识、魄力和科学精神，他个人的作用必须得到充分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当时的特定环境，看到群众的作用，看到省委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应该说“责任田”是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产物，是广大干部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责任田”的形成有来自多方面推动力量的支持，这是我们在研究“责任田”时不能忽略的。

首先，来自中央纠“左”的努力和政策的推动。从1958年大搞“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以后，“左”的思潮席卷全国，势头强劲，并成为主要的指导方针。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许多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1959年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左”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农村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法加以缓解和解决，其中确有一些属于纠“左”的范围。例如，一再强调划小基本核算单位，强调注意发挥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特别是一再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解决好平均主义问题，这些虽然与实行“责任田”没有直接关系，但中央纠“左”的想法和

举措,使广大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也激发了他们冲破“左”的束缚的勇气,努力探索改变旧体制的方法,应该说这也为“责任田”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二,来自群众的实践经验。在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公社化的过程中,各地在农业生产管理上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当时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就一再强调在农业生产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改进社队的包工包产办法。为了解决高级合作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安徽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5年7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提高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强调指出:“实行包工制是搞好生产合作社管理的关键。”党的八大以后,各地全面整顿合作社。1956年12月安徽省委又根据新的情况,下发了《关于今冬明春整顿农业社的指示(草稿)》,强调农业社管理委员会对生产队进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费用。生产队对适合生产组整理的农活,应当实行小组包工,或小组计件;一些田间管理的农活便于分户管理,实行按户包工,以明确责任,便于检查。对适合个人计件的农活,也可以实行个人计件。1957年3月26日,省委专门下发了《关于推广田间管理工作包产到户的通知》,明确指出:这样做“能够减少生产队零星配工和记工的麻烦,也可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便于做好集体劳动、个人劳动和家庭老少劳动的安排”。在安徽省委不断放宽政策的情况下,阜阳县的新华农业社实行了分户承包田间管理办法。该办法一出现就受到群众的欢迎,得到安徽省委的支持。当时宿县一些社队也积极改进了包工包产办法,《宿县报》以醒目的标题进行了宣传。例如:3月1日刊登《红旗一社制定包工包产办法的经验》,4月1日刊登《褚兰乡桂光农业社第三生产队实行按件包工》,7月16日刊登《和平公社建立了田间管理个人负责制》。《宿县报》还曾发表社论,论述怎样搞好包工包产。当时芜湖、六安、安庆等地区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这个发展趋势可

以看出,从合作化以来,加强和改进包工包产责任制始终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但当年关于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在1957年的反右和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中受到了严厉批判,包产到户的做法更被彻底否定。紧接着,1958年又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风暴,包工包产责任制受到很大冲击,共产风、瞎指挥风盛极一时,给农村带来了大灾难,但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留下了可贵的启迪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第三,来自群众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许多“左”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首先身受其害的是广大农民,他们迫切要求改弦易辙,走出困境。1961年初,柯庆施从上海来安徽,途经全椒县古河公社,同社员交谈时,几位农民说:“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我们保证种好。”并且质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同年3月间,曾希圣在稻香楼宾馆召开了七位劳动模范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大家对农村包工包产问题的意见。这些人中,有的是公社党委书记,有的是大队总支部书记,有的是生产队干部,也有的是普通社员。曾希圣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提出来让大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不是单干,能增加社员的责任心,推行这个办法肯定能增产。具体态度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积极主张推行这个办法;一种是很赞成这个办法,但是否马上干还没下决心;一种是认为办法好是好,但有顾虑,怕有些农活大家争先恐后干,队长不好当。

正是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坚定了省委领导推行“责任田”的决心,同时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在实际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加强具体指导,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

第四,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恢复实事求是和加强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指示,给大家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探索的勇气。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

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强调指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图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他还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是搞得比较好的，长征时对敌情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曾有希圣的“玻璃杯”（情报工作）。我们当时在山东省委听传达，感到这一节内容，明显涉及曾希圣，既是给曾希圣打气，又是指点迷津，曾希圣肯定从中受到很大鼓舞和教益。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一封信》，并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即原来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强调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里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真是分量十足，掷地有声，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改革创新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总之，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党内端正思想路线，也鼓舞了各地在农村生产管理体制上的大胆探索，这是“责任田”得以出现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政治氛围。没有比较民主的氛围，“责任田”是不可能诞生和发展的。